

人文
学术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主编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

方维规 著

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Literary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方维规 著

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Literary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方维规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465-3

I. 文… II. 方…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②文学史-文集 IV. ①I0-53②I1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263 号



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方维规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8.5 字数 279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65-3/I · 826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矻矻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译介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尽的源泉;自古以来,中国外有与印度、日本、波斯等国的深远的文化交往,内有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并存、协同发展的历史,从而培育生长出一种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的屈辱历史,激发了百年来对外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勤奋学习,在阵痛中促成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萌芽、产生,正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跨越了人类文化的区域界限,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上进行深入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是屈辱的近代经验,都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术的丰富资源。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有理由和责任坚定地促进多元文化的对话、发展,推动世界文学在平等对话和交流中互识、互补、互动,和而不同,融而不一,为把各种文化与文学的特点发展到各自的极致,为丰富全球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

三十而立,意味着既有所成,亦有所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在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译介学、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比较文学的活力,始终来自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它们包括传统的文艺学、中外国别文学、翻译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文化研究、影视研究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收入本丛书的诸位学人,有的是中国本土学者,也有的长期在海外知名大学任教,他们都以中国文化与文学作为根基,放眼世界文学的广阔时空,从不尽相同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理论方法切入,探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发展。他们不仅为学科复兴与体系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阐释、方法探索和范式建构等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而立,同时应立有所向,开启新的学术发展可能。丛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有意关注并接纳中国比较文学未来三十年发展与提升的原创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丛书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但也将关注具有完整结构性的论著:系统性论述同样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表征,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探讨。

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比较文学论著加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一起见证并进一步推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学科发展,为世界比较文学繁荣做出中国学人的贡献。

谢天振 陈思和 宋炳辉

2011年4月8日

序 言

2013年酷暑,炳辉君来电邀稿,加入天振、思和两位先生和他主编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丛书的行列;用他的话说,是“加盟”。我的第一感受是同行信任,颇有荣幸之感。接着的感受是惭愧,感觉自己近些年来在这个领域成就一般;加之实在没有时间,无暇翻译外文旧作,显然难以结集成书。考虑几天之后,还是谢绝了主编们的美意。炳辉对此的反应是“意外”和“失落”,但是他很执著,让我不要马上回绝,并在信中耐心解释了丛书的编辑意图;他还根据我的研究方向,罗列了几个理应甄选的专题板块,读来似乎有理。我想,拒绝来自上海母校的恳切请求,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或曰不识抬举,最后还是答应献丑。

在我读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时候,比较文学是一门显学。因此,1986年去德国留学,选择的第一专业就是比较文学。在德国读比较文学门槛较高,首先要过语言关。我在注册时,必须拿出掌握四种语言的证明材料。的确,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是比较辛苦的。师从狄泽林克(H. Dyserinck),深感荣幸。虽然师出名门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回头想来,在他那里没有白读。记得起初与导师谈论文设想时,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书使人愚蠢,关键是把你的论文写好。我当然明白,要写好论文,不读书是不行的。他的意思是暂时少看闲书。感到欣慰的是,五年时间拿下了博士论文,这在德国不算慢。论文出版以后在西方学界的征引率较高,多少满足了一些虚荣心。尽管博士论文纯属比较文学,后来的教授论文亦与比较文学有关,但是我在德国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至少在名义上与这门专业有点距离。比较文学成了偶尔关注的东西。

关于这本书的设计,本想翻译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中的个别篇章,但是实在日不暇给,因而拾掇了回国以后用中文撰写的相关文章。利用这次机会,一些已经发表、但因相关刊物篇幅所限而未能全文发表的文章,得以展示全貌。丛书编者希望收录几篇概念史论文,这也确实是本人近些年来最

用心、耗时最多的研究课题,参加的学术活动和研讨会多半与此有关。尽管丛书的编辑思路中有“学术个性”“学术前沿性”“独特贡献”等字样,鉴于本书主题和规定篇幅,概念史篇什只能付诸阙如。上文谨书前后因缘。

本书共分四辑。第一、第二辑探讨的是文学理论问题,也是比较文学的应有之题。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学术中没有独立的文学理论学科,也就是中国所谓的“文艺学”。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史中,对于这个学科的定位亦即称谓,曾有法语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英语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或德语 *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也就是“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一复合形式。弗里德里希(W. P. Friederich)于1952年在查佩尔希尔创刊的美国比较文学年鉴,名为《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德法等国的比较文学教席、研究所和专业协会,曾经常见这个名称。换言之,这个专业原初就包含两个部分:既包括比较历史部分,即分析各种文学之间的异同及其相关问题;又包括比较体系部分,即文学理论和方法学。也就是说,“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即超国界文学研究的理论部分。梵·第根(P. van Tieghem)早就把“总体文学”看作真正的比较文学之璀璨顶峰。而在美国比较文学模式中,“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则指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理论和比较方法学。韦勒克(R. Wellek)和沃伦(A. Warren)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文学理论》,探讨跨国理论和方法,依然堪称“总体文学”的代表作。做理论需要比较,比较的目的旨在理论,也就是在比较中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不过,就专业名称而言,人们最终还是青睐“比较文学”这一简略形式(法: *Littérature Comparée*; 英: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德: *Komparatistik*; 西: *Litteratura Comparada*; 意: *Letteratura Comparata*)。

这个专业名称常会让人首先想到“比较”,尤其是外行会望文生义。两种密切相关的观点相沿成俗:其一,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事情;其二,比较文学本该界定为文学比较研究。今天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跛足的。比较文学早就不像在19世纪那样,与比较自然科学(例如比较解剖学)相对应,严格地自视为文学比较学科,而且唯有比较。其实,我们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中所能见到的20世纪初期那种对于“文学比较”的笃信,后来越来越少。尽管施泰纳(G. Steiner)曾强调指出,文学研究与艺术阐释从来就是“比

较”；并且，借助比较的审美判断与阐释学论述，是分析和探讨文学作品的常数。可是，他不是再说一种特定的、轮廓明晰的方法。艾田伯(R. Étiemble)于1963年发表名著《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在晚近或此前的不少比较文学定义中，“比较”已经无关宏旨。这尤其见之于那些把比较文学看作世界文学研究的模式，也就是世界文学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此外，西方比较文学家反对过于拘泥于这个学科的名称，已经年深岁久。科彭(E. Koppen)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指出，当今比较文学主要关注一些完全别样的问题；在比较文学中，对照要比比较更典型；即便在那些确实要做比较的地方，也不再是19世纪所理解的比较。的确，当今比较文学对于研究对象的确定，多半是探讨和剖析至少两种不同语言之文学中的文学现象、特别是文本现象，比较仅为一种研究可能性。

本书第一、第二辑分别论述“文学社会学”与“接受美学”。其中，有些内容是初次介绍到中国，如许京的文学趣味社会学，或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另有一些文章所论之题，其实在中国学界已不新鲜，都曾有人做过研究。重拾这些论题，我不认为是老调重弹。这不仅在于有些命题值得一再考究，也不只因为人的认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有些研究方向所寻求的答案至今尚无定论，比如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这里顺便提一句：埃斯卡皮(R. 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1958)和菲根(H. N. Fügen)的《文学社会学的主要方向及其方法》(1964)，常被视为这个学科之真正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而两位作者也是比较文学家。钻研这些论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除了本人近些年在北师大文艺学的教学工作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学界引进外国理论的实际状况。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西书翻译处于“大跃进”时期，跟风、抢滩者争先恐后，几乎译介了所有外国时髦理论，或者因为此前的闭塞而未听闻的学说。可是我们不得不说，当一切已成往事、已被载入我们的接受史后，有些理论(或曰其关键环节)似乎从来没被真正领悟。不少人依然停留于浅尝辄止的满足。因此，就这两个专题而言，笔者并无多少创新奢望，只求多介绍一些中国学人尚未涉猎或知之不多的东西，或者把有些问题说清楚。

第三辑“文学形象学阐微”的学科关联无须赘言，这也是本人所属德国亚琛比较文学学派的“嗜好”。狄泽林克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首屈一指的

人物,也是20世纪50年代加雷(J. M. Carré)和基亚(M. F. Guyard)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不少人称为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我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法兰克福、伯尔尼、维也纳、巴黎、纽约: Peter Lang, 1992)和教授论文《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 1919—1949》(威斯巴登: Harrassowitz, 2006),都与比较文学形象学有关,前者探讨“他者形象”,后者关乎“自我形象”,并尝试从形象学视角出发编撰文学史。我在《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上发表的译文《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狄泽林克)及“译者按”,首次在中国介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二十年来,中国学界不但关注这一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一些可喜成就,尽管有些研究并非明确的形象学课题。对于形象学的历史、方法和特点的评介,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第三辑便是几篇与形象学定义和方法有关的书评和小文。

第四辑是一组与国际汉学有关的文章。已经在中国成为“显学”的海外汉学,乍看与比较文学无多关联,其实不然。就方法论而言,开放的比较文学从不排斥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沟通;更何况跨国性研究与超国界意识和立场,既是比较文学观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如果我们仔细考查汉学研究中的某些论题,例如中国经典解读、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翻译研究、语言符号阐释等,马上就会发现,它们何尝不也是比较文学论题呢?两者甚至有着天然联系。世界上身兼汉学家与比较文学家者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者,当数比较文学和汉学大家艾田伯。迄今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跨国视野和超国界性质在有些汉学命题中彰显无遗;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汉学与比较文学的有机结合具有很大潜力,很可能为比较文学这一超国界学科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想要无限制地扩大比较文学的领地,况且汉学研究也不是都可拿来与比较文学衔接的。我所强调的是在汉学研究中发现比较文学论题,在汉学材料中选择和提炼超国界研究的素材。简言之,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跨学科的重要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选录了几篇与汉学有关的论文或书评,它们的方法上与比较文学多少有些契合之处。而设置这一辑的真正原因,是这些文章与本人近期的学术兴趣直接有关。汉学是中国之外的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作为曾经长期在外的学人和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我曾参与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大型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个西学

东渐之汉语历史语义学亦即概念史课题,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亦涉及不少思想史问题。第四辑中的两篇与人商榷有关问题的文章,能够从一个侧面窥见本人在这个领域做过的探讨。谓之“商榷”,并非客套,笔者确实诚心与人讨论。对于不少学术问题,委实需要进一步讨论辨明、反复商榷。发表不同观点,不但于学术有益,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其实,起首那篇小文谈论自己对“汉学”和“汉学主义”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篇商榷文章。在这个上下文里,我想捎带提一下所选文章的文笔:本书主要由论文组成,因相关论题而收录部分书评、笔谈或随笔。于是,整体风格自然不一。读者一定能够理解,这是文章汇编所致。

最后,我想就书名中的“历史意识”做一些说明,并用大约相近的“历史性”来替换本书中的这一核心理念:“历史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自这个概念的本义,与研究方法有关,用“历史性”来表示学术中纯粹的实证方法,亦即深入的历史考证。同时,“历史性”也指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也就是研究者借助所能看到和可能收集到的史料来说明经验和行为、人和事物的历史存在。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想到的首先是做学问时的重考据的态度,至少是一种追求。“历史性”是做学问的任务和视角。换言之,文章应该言之有物。即便是纯理论文章,即便理论本身艰深难懂,“历史性”也是说明问题的重要途径。至于我本人做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看了后文做出判断。这里还须说明的是,此处“历史性”主要在说材料功夫以及尽可能的“客观性”,并不代表观点本身。观点的成立,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历史性或客观性,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当今展示,它还包含或观照历史的形式、题材、新解、呈现甚至发明等因素。不过,这都有其严格的界线,即知识或学识所认定的“曾经如此”。比如:我们可以重构屈原的生平,甚至由于原始资料的不足而添加许多东西;可是,我们不能在一部可信的历史中,说屈原在唐玄宗时代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这会与历史传承及我们的知识大相径庭。

“历史性”的第二个方面,多少有些哲学意味。在欧洲学术用语中,法语“历史性”(historicité)概念首次出现于1872年;英语对应词 historicity,约出现于1882/1983年。德语中的这个概念 Geschichtlichkeit 或 Historizität,早已见之于黑格尔、施莱尔马赫或谢林的著述。将“历史性”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强调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文本,以及解读本身的历史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万物皆流”之说: πάντα ῥεῖ (pánta rheí),或许

可被视为历史通则。他所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揭示的是世间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的确，没有变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在变动不居中，各种理论相继而出；并且，各种理论话语形式都与其他理论、言说和实践相互影响，即所谓互文性。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躲过历史关联，其中有继承发展，也有背道而驰。换句话说，眼前之物只有了解其形成才能完全被理解。另外，历史性是个体感受历史的现今表现形式，是传流而来的现实结果，也是现时建构历史的产物。历史有很多面相，今人只能或只愿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复制。用福柯的话说，历史只能是现今所见历史。回顾历史或重构历史，现时会对思想产生影响，或曰思想本身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历史性是今天能够得知的东西与现时状况的结合体。将“历史性”用于解读各种文学理论，可称为理论的历史性与理解的历史性。这也是我对理论研究的理解。

编完书稿，上网查找了这套文库已经出版的著作，发现作者中有我长年钦敬的长者，亦有不少学界老友；另有一些学者，虽然未曾谋面，但已久仰其名。但愿我的参与不是滥竽充数。无论如何，笔者自知学力不足，书中舛误和偏颇之处，自不能免，尚乞同道正之为幸。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辑 坎坷的文学社会学

文学趣味社会学的一个命题：虚悬的时代精神	3
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	17
豪泽尔“中间道路”的艺术史观	36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	
——读本雅明	52

第二辑 德国“接受理论”汇考

“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	89
“交往美学”	
——一个未受重视的理论	145

第三辑 文学形象学阐微

形象、幻象、想象及其他	179
关于形象学的若干思考	
——读书琐记	186
被神秘化的“中国灵魂”：论他国形象的产生及其特征	193

第四辑 汉学研究杂论

“汉学”和“汉学主义”刍议	227
谁造就了“史密斯热”？	
——就《中国人的特性》与诸学者商榷	235
一个有悖史实的生造“衍指符号”	
——就《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夷/barbarian”的解读与刘禾商榷	251
语言与思辨	
——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263

第一辑

坎坷的文学社会学

- 文学趣味社会学的一个命题：虚悬的时代精神
- 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
- 豪泽尔“中间道路”的艺术史观
-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

文学趣味社会学的一个命题：虚悬的时代精神

一、“后美学时期”的趣味观

西方的“趣味”概念(意、西: gusto, 法: goût, 英: taste, 德: Geschmack)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意、西、法、英语中流行,德语则在稍后从邻国翻译了这个术语。“趣味”表示一种分辨性的审美价值判断能力,先于理论思考,源于审美体验,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形式和极为感性的概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审美能力意义上的“趣味”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人格拉西安(B. Gracián)第一个使“趣味”成为批评术语,17世纪的法兰西沙龙文化则是注重“得体”和“风雅”趣味的社会温床。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沙夫兹博里(A. A. C. Shaftesbury)、哈奇生(F. Hutcheson)等人均探讨过审美趣味问题。之后,趣味的哲学意义日渐突出,越来越得到哲学家的关注,如伯克(E. Burke)的《关于崇高与美的根源的哲学探讨》(1756)和休谟(D. Hume)的《论品味的标准》(1757)。尤其是康德(I. Kant)的《判断力批判》(1793)的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批判》,对趣味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直到20世纪的克罗齐(B. Croce),关于“趣味”的讨论和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

如果说历代美学家对趣味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属于“美学时期”的思考亦即自上而下的思辨美学,“后美学时期”或曰社会学时期则不再那么萦注传统“趣味”了。普列汉诺夫(G. Plekhanov)的第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发表于1899年,标题便是《论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他的论文《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以及梅林(F. Mehring)的论文《论艺术趣味的历史条件》^①,

^① 该文约写作于1900年前后,载梅林:《文学史论集》,海斯特整理、编辑,柏林,1848年,第73—79页(Franz Mehring, “Über die historischen Bedingungen des Kunstgeschmacks”, in: *Beiträge zur Literaturgeschichte*, bearb. u. hrsg. von Walter Heist, Berlin, 1948)。译文见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5—312页(方维规译)。

都在历史环境和时代土壤中寻找精神需求和各种趣味的根源,其历史和社会维度是显而易见的,甚至颇具“社会学”特色。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语境中的趣味或艺术趣味,都是较为宽泛的概念;除了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审美和鉴赏力意义上的“趣味”和“爱好”外,它常常具有文化“需求”“期待”“追求”等含义。如果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一样受着趣味的驱使和摆布^①,那么,在文化生活(文学生产与接受)的不同场域中,不同的文学则是为了满足不同的文化和文学需求。这必然关涉读者的社会层次和阶层,涉及“满足谁的需求”这一问题。因此,作家的语言习惯、作品体裁、形式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影响,作品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确立之后,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受众和传播研究。文学的交流功能及其特色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当初,不少文学社会学学者认为,以往的文学理论几乎只关注作家和作品,忽视了文学作为交流手段的特殊功用以及文学消费。一个作家通常采用的是他的说话对象能够理解的表达方法;接受者的理解能力是作家传达思想时必须顾及的因素。

什么是美?什么是品味?今天的趣味同昨天的或许不一样?趣味的变化是否导致艺术手段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其实一百年前早已有人做过思考。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英美文学史家和莎士比亚专家许京(Levin Ludwig Schücking, 1878—1964)于1913年发表论文《文学史与趣味史:试论一个新的问题》,首次提出了“文学趣味社会学”概念,将文学趣味和风格同社会土壤的变迁联系起来,试图以审美趣味问题进入“文学社会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他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学视角,尤其是其专著《文学趣味社会学》(1923)使他获得国际声誉。另外,他的专著《清教主义中的家庭——论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与家庭》(1929)被后来的实证主义文学社会学家视为研究典范。

许京对文学趣味社会学的论述,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而且是整个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文献,给后人提供了不少方法论启示。时至今日,他的观点还时常在一些西方文论中被人引用。本文介绍的就是在中国学术界几

①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39—140页。